

疫情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启示

俞加北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早已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经济开始全面复苏。纵观疫情对我区制造业企业造成的影响及之后复工复产的全过程,无疑为企业该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好好上了一堂课。这当中,笔者认为表现最优异的,就是一些数字化的手段。

远程办公、视频会议……这些疫情防控期间企业“被迫”采取的新型办公方式,恰恰是在数字化转型后的常态办公方式。而要求生产一线员工不密集站位、减少接触、实时监控体温等身体状况,这些传统密集型生产企业面对疫情防控时的大难题,却能在实现“智能生产”后轻松做到。

何以数字化转型会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如此优异?笔者认为,其关键就是数字化转型大幅增强了企业对于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智能”二字。何谓智能?就是一个主体适应、改变、选择环境的各种行为能力,也可以说是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情节时,摆脱机械思维,像人脑一样作出针对性选择。

以我区传统优势产业服装业为例,在新经济下,发展所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对多样化的需求,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和周围人撞衫,衣服要为我量身定制”。针对这张考卷,位于裘村镇的蒙达制衣有限公司就交出了高分答案:自主开发一套“智慧定制”系统,让消费者用手机自拍一张全身照发给厂家,过一两天就能收到量身定制的衬衫。面对消费者迥异的身高、体重、体型、相貌、气质等因素,这家企业“智能”地实现了不见面精准量体裁衣,为衬衫定制开辟了一条全新途径。

今年,所有企业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就是“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但即便面对席卷全球的不确定性因素,数字化转型后的企业仍能“智能”地推出针对性措施。如上文所说的,在办公管理上运用数字化手段的远程办公和视频会议;又如在产品销售上,借助互联网平台

而生的云展会、直播带货等。

浙江省是国内较早全面推进政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省份之一,同样也是此次国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之后经济复苏情况最佳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我区一直紧随省市步伐,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仍然实现了正增长。其背后,数字化转型可谓是功不可没。

可以说,此次疫情防控为企业带来原料、员工、管理等方面挑战的同时,也激发了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客观上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善用大数据推动社会“智理”

景小芳

日前,一条“95后小伙旷工救助一名触电垂危的装修工人”的新闻,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在大家为这个年轻小伙见义勇为行为点赞的同时,一款“互联急救”的手机应用,也因在事件中发挥精准自动定位、快速呼叫周边急救员等作用,被大家追捧为“神器”。

笔者了解到,其实早在2015年,杭州市急救中心就推出了这款手机应用,具有一键呼叫120、快速自动定位、预存健康档案并自动推送到急救中心调度台、求助亲友、急救知识自学等功能。市民只需在智能手机上安装该应用,提前输入自己或家人的健康信息并存储在云端,当呼叫120时,按一下“互联急救”上对应患者的呼救按钮,云端预存储的患者健康信息及当前位置就可直接发送到120调度座席以及事发地附近的急救志愿者手上。

事实上,随着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这样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的案例越来越多。去年11月,贵州公安就上线了110微信报警系统。相比以往报警通过电话口述,微信视频报警有着更“智能”的优势。它不仅可以定位群众报警地址,还能上传图片视频,让报警群众和民警面对面交流,更有利于实现派警、出警、处置的全流程跟踪。

这些“神器”的运用,让市民切身感受到了科技助推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也意味着社会治理的决策思维、范式和方法正在向以多元主体参与为前提、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社会“智理”体系转变。

笔者认为,再好的技术也只是一种工具,而善用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来创新社会治理,夯实社会治理智能化应用根基,就能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智能化能力。新的技术手段革新,吸引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从而促使社会治理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更加有序、更加安全、更加幸福。



新华社发 徐骏作

选择

筑巢方能引凤
谈如何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返乡

李露

近日,笔者前往我区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地区吉林省延边州安图县采访。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安图县发生了逆转贫困的巨大变化,也涌现了一批典型。

但在采访中,笔者发现一个问题:安图县人才流失严重,尤其是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一方面,青壮年外出务工,村里老年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口逐年增加;另一方面,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发展主导产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实际上,这些地方恰恰才是最需要人才的。

其实,虽不及安图严重,但奉化同样受该问题困扰。从农村走出去的青壮年中,凡是能到省城或外地就学深造的青年大学生,毕业后鲜有愿意回乡工作或创业的,往往把自己的第一次就业创业之地选择在更利于自己发展的上海、杭州等地,一旦落地扎根,就更少有人愿意回乡了。

笔者认为,要破解农村人才严重流失的问题,首先是要加强宏观政策调控。政府应从政治待遇、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定向培养、企业对口帮扶等方面加大政策的引导支持力度,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其次是要促进产业提质增效,推进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夯实发展基础,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返乡,为乡村振兴

头盔岂是为交警而戴

陈培芳

前几日在下班回家路上,笔者看到这样一幕:一名未按要求佩戴头盔的骑电动自行车男子,看见不远处有交警执勤后,立即将挂在车把手的头盔戴起来,待离开交警视线后,他又摘下头盔挂回原位。平时,笔者也时常听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发出这样的言论:这个点交警都下班了,不戴头盔也没人查。

“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文规定的。近年来,许多城市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也要佩戴头盔。为什么一定要戴头盔?道理显而易见,头部是人体最为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撞击,轻者可能脑震荡,重者甚至会造成脑膜下腔出血,难以医治甚至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对于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来说,相当于轿车驾驶员所系的安全带,是驾驶人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律明文规定、道理人人皆知,但为何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反面案例依然不少?为何这些人就是不遵守,甚至无视安全规则?

“刚才没有礼让行人,不知道有没有被抓拍”“这个路段没有摄像头,开车打电话没关系”“闯个红灯就扣6分,扣得也太多了”……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名交通参与者,我们在违反交法规时,下意识的反应不是反思错误、想想后果,而是更担心会不会被抓、会不会被罚,仿佛自己遵纪守法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而是不被“逮住”、不被罚款扣分。这样的心理,使得遵守交法规在一些人心中变成了一种负担。就像佩戴安全头盔,本应是自觉自愿、保护自己的行为,有的人却只嫌麻烦,认为戴头盔只是为了防交警查,等到事故发生了,方知一切都已太迟。

处罚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如今,科技越来越先进、管理越来越严格,为什么仍有一部分人安全意识淡薄?头盔为自己而戴、为安全而戴,而不是为交警而戴,只有增强对安全的理解,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身的安全负责,“戴头盔”才会成为自觉的行动。交通安全也好,生产安全、消防安全也罢,“查与不查一个样”,才是我们对安全该有的态度。

警惕手机应用肆意侵犯我们的隐私

袁冰露

手机上安装的应用软件,在你不知情的时会随意访问手机里的照片;手机上网购了一个儿童电话手表,不久会收到来自儿童培训机构的骚扰电话……这样的情况你是否遇到过,是否觉得十分可怕?

近日,有市民告诉笔者,自己的手机增加了应用隐私记录功能后,就会频繁自启动,甚至有应用软件十几分钟内访问手机照片、文件超2万次,还有很多常用的社交、办

公、娱乐软件也存在后台高频读取手机信息的行为。

其实APP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现象早已存在,美其名曰“大数据时代下的精准服务”。但如此得寸进尺的访问照片和文件等行为,令人不寒而栗。监管部门也曾多次采取整治行动,包括公布存在类似违规现象的应用软件及企业“黑名单”,采取约谈及行政处罚等手段。但从根本上说,乱象并未得到根治,消费者隐私被严重侵犯的事件仍不时上演。个人信息安全,是保障我们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基础。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建立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管大环境,已刻不容缓。

笔者以为,要整治这些手机应用软件的侵权乱象,首先应将监管前置。监管部门在应用软件上架前应增加用户隐私保护相关许可,严格从源头把关,真正管到实处,加大惩处力度,提升威慑力,筑牢网络信息安全底线。其次,对侵权违法的

应用软件要敢于采用法律手段。《民法典》在总则和人格权编第六章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网络安全法》更是强化了个人信息保护,用法律约束应用软件的侵权行为。故而,用户在受到隐私侵犯时,要敢于站出来,敢于起诉这些应用软件,让他们无存身之处。同时,司法、工信、消保委等部门应主动承担相应职责,以更强有力有效的举措,将监管和为消费者维权纳入常态化工作,保护消费者隐私,实现网络信息更加安全。